

批判光明日报参考資料

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研究部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 合編

光明日報社印

1957年9月

目 录

(一)

光明日报在章伯鈞、儲安平篡改政治方向期間 所犯錯誤的檢查.....光明日报編輯部 (1)	
关于“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負責制”报道錯誤的檢查光明日报編輯部 (19)	
讀者对光明日报刊登“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負責制”的錯誤报道 的批判..... (21)	
希望光明日报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林茵 (22)	
徹底檢查篡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的責任.....高天 (26)	
光明日报編輯部为什么不檢查6月7日的座談会.....大純 (29)	
“早春”前后.....費孝通 (33)	
会外之音.....范朴齋 (37)	
大胆貫徹“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光明日报社論 (41)	
春天的感应.....文冰 (44)	
关于“六經注我”的談話.....文冰 (51)	
政治待遇与齋齋生活.....文冰 (56)	
武汉書簡.....文冰 (62)	
“四顧無知己比鄰若天涯”.....文冰 (66)	

第一朵“迎春花”	殷毅 (73)
附：“迎春花”掩盖下的“第一槍”	李翔 (77)
中国人民大学象个教条主义大蜂窝	徐頤 (82)
是蜜蜂，不是蒼蠅	張友鸞 (86)
附：張友鸞的文章是“蒼蠅”不是“蜜蜂”	黃卓明 (91)
知識分子聞“放”之初	光明日報記者 (96)
為“放”而爭	光明日報記者 (101)
何所惧，何所不惧	光明日報記者 (104)

(三)

武汉知識界的“鳴”“放”密云不雨，許多知識分子 希望領導大膽放手	(109)
沈陽文教部門“鳴”“放”空氣比較稀薄，問題在於 黨群關係不正常	(110)
南京的鳴放在下層阻礙不少，轟開局面，還看領導， 民主黨派人士在本报座談會上熱烈發言	(111)
推倒牆填平溝改善黨群關係	(114)
武汉市教授專家在本报座談會上暢談。填平黨群鴻溝 時機已屆，希望高教部下決心克服官僚主義	(116)
北京師大領導不肯大膽的“放”，教授們提出尖銳批判評	(119)
中共統戰部、清華大學黨委會、民盟、九三學社等開座談會 討論改變高等學校黨委負責制問題，民主黨派提出要確定民 主黨派基層組織在學校的地位和作用	(121)
研究清華大學中共和民主黨派基層組織關係問題的座談會繼續 舉行，討論民主黨派在高等學校的地位和作用	(125)
附：高等學校中黨與民主黨派怎樣合作共事	(129)
北京航空學院官氣十足，在黨群之間有一座“萬里長城”， 連日舉行座談不少教授尚有顧慮	(134)
復旦大學取消黨委負責制，加強校務委員會作為學校最高領導	

機構·····	(130)
附：陳望道和楊西光說：復旦大學沒有取消黨委負責制·····	(137)
陳望道談加強校務委員會問題，復旦大學黨委制並未取消·····	(138)
清華大學教授尚未做到開懷暢談，有些教授的發言中漏出 清華大學存在不少問題·····	(139)
附：清華園里的百余教授開懷暢談，不應該用搞運動的方法 辦教育·····	(141)
北京大學開辟“民主牆”，一邊努力學習，一邊提出不少意見， 幫助整風·····	(145)
首都各大學大字報的綜合報道·····	(147)
西安各民主黨派討論毛主席講話，對發揮民主黨派作用提出 很多意見·····	(150)
堅決相信共產黨大膽揭露矛盾，有人怕報復要農工民主黨派 撐腰，專家教授在農工民主黨座談會上提出很多意見·····	(152)

(四)

武漢知識界談黨群關係問題·····	(157)
武漢地區一部分教授在本报座談會上說：請高等教育部听听 我們的聲音·····	(170)
貫徹“鳴”和“放”的方針，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 主觀主義·····	(180)
加強互相監督，開展民主生活，改進黨群關係·····	(193)

(五)

標題·····	(215)
---------	-------

光明日报在章伯鈞、儲安平篡改政治方向 期間所犯錯誤的檢查

光明日报編輯部

我們在反对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章伯鈞、儲安平篡改本報政治方向舉行的同時，對編輯部工作進行了檢查。正如6月14日人民日報編輯部寫的“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文章中對本報所作的批評，在儲安平實際掌握編輯業務的這短短的一段時間內，即是从5月到6月上旬期間，本報內基本政治方向變成了資產階級報紙的方向。

儲安平是4月1日到職的。頭三個星期，他是在編輯部“了解情況”。4月19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協商決定光明日報完全由民主黨派獨立自主來辦，並撤銷黨組。儲安平從這個時候開始實際掌握編輯業務，並且按照章羅聯盟的政治陰謀，利用“百家爭鳴”這個口號和共產黨的整風運動，在報紙上發表了大量表現資產階級觀點而並不準備批判的文章和帶煽動性的報道。八年來驅決站在社會主義旗幟下的衷心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這張民主黨派報紙——光明日報，就這樣地被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攫為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宣傳工具。

我們不能不憤怒地來控訴章伯鈞、儲安平把我們的報紙拉出了社會主義軌道、作為他們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工具的罪行。

章羅聯盟企圖篡改本報政治方向，同文匯報相呼應，為他們的政治陰謀進行煽惑鼓動，早就有了打算。在黨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後，章伯鈞對本報即表示分外的關心。去年夏天，章伯鈞已有若干活動。儲安平擔任總編輯以後，章伯鈞對報社工作空前地“積極”起來。他曾幾次來到報社，與儲安平有所策劃。儲安平也口口聲聲說章社長對這有指示，對那有意見。儲安平也時常用信件、電話、面談等方

式，向章伯鈞兼報工作。他們之間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可是把報社最高管理機關——社務委員會完全撤開，迄儲安平辭職前，沒有召開過一次會議。

根據已經揭露的材料，章伯鈞曾提出這樣一些意見：一、他認為本報過去帶頭橫排，現在可以帶頭直排。這是他反對文字改革一套活動中的一個部分。二、他要報紙多報道民主黨派負責人的活動。實質上，就是要我們替他作宣傳，抬高他的地位，作為政治陰謀的資本。三、他主張多登資本主義國家通訊社的新聞，多反映資本主義國家社會黨的活動。儲安平對這些意見，竭力支持。章伯鈞在5月中旬曾特地來報社通知儲安平，說這樣的熱鬧還要繼續一年半載，主張趕快把所有的專刊都停掉，騰出版面來作反黨的宣傳。在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發表的前夕，他打電話給儲安平，說章乃器批評光明日報在“收”了，這樣來為儲安平的反黨宣傳打氣。至於進一步控制本報作為章羅聯盟的宣傳工具，章伯鈞最近已經承認：關於光明日報的整個改組，要等到摸清情況後再說。可見他們是大有一番計劃的。

為了篡改本報的政治方向，儲安平來到報社後，進行了不少的活動。首先，他宣傳了章羅聯盟的辦報主張。他認為，今天的報紙，應該回頭來向解放前國民黨地區的舊報紙學習；向文匯報學習。他否認報紙有指導工作、推動工作的作用。他把我們報紙八年來所發表的社論，一口否定；他認為那些社論不是歌功頌德的，就是教條主義的。他主張要寫社論，就要寫他所謂的“批評性”的、起“監督”作用的社論。而他又認為這樣的社論不好寫，因為本報是各民主黨派聯合主辦的，“婆婆”太多。所以，在我國政治生活如此重要的時期里，對黨的整風、對國內重大問題，除掉在5月4日發表了一篇有嚴重錯誤的社論外，他不但不去組織社論，就是已經寫好的關於共青團第三次代表大會的社論，也加以挑剔、不准刊登。在新聞報道上，他的方針實際上就是“只管揭露，抹殺成績”八個大字。他曾公開說：“我們的任務是揭露，解決問題是共產黨的事。”他主張只要是事實，什麼新聞都可以登。他喜歡搶新聞，喜歡“獨家新聞”，喜歡內幕新聞。他要我們的編輯、記者不怕閹割。他說，報紙和共產黨、人民政府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即是有些新聞，揭

紙要登，黨和政府不要登。他主張在國際報道方面要用帝國主義國家的通訊社的消息，而且要不加分析地直接採用。他還要多多報道資本主義國家社會黨的活動。他說目前各報的國際新聞編排得很不好，不適合知識分子的口味，並以費孝通的意見為代表。在干部中間，儲安平還以“了解情況”、“走群眾路線”為名，用各種面孔和手段，兜售他的資產階級辦報路線，并摸編輯部的底。在這期間，儲安平不僅要看他認為重要稿件的小樣，而且有些稿子由他親自約來或親自處理；重要採訪工作，他故意擺脫總編室主任或部主任黨員負責同志，親自指揮。

在這期間，由於儲安平執行章羅聯盟的政治陰謀，我們的報紙攻訐黨對文教事業的領導；歪曲黨的政策，挑撥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散布對黨的不滿情緒；鼓吹絕對民主和個人主義的自由；煽動大學生鬧事；歪曲民主黨派和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誇大人民內部矛盾，否定成績，把新中國塗成一片漆黑；宣傳資產階級新聞觀點和作風。在編排方法上，着意渲染，加強了惡劣的宣傳效果。

編輯部的工作同志，在這一段時期里，在採訪、編輯工作上，也有不少人犯了相當嚴重的錯誤。對於這些錯誤，我們正在嚴肅認真地進行檢查。

感謝黨及時向我們發出了警號，指示我們從錯誤中清醒過來，和全國人民一道向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展開了鬥爭，把我們的報紙轉回到革命的社會主義的道路上來。

感謝廣大的讀者，及時向我們提出了批評。我們收到大量的讀者來信，指出宣傳上的許多錯誤。有不少讀者，還親自到報社來提意見。有的讀者來報社要向儲安平說理。讀者的批評，對我們的工作檢查有很大的幫助，我們誠懇接受，並在這里致謝，不再分別函復了。

處處點火的九大城市座談會

儲安平抓業務的第一步，就是派出記者到九大城市召開座談會，處處點火，打亂整風步驟。煽動人民對黨不滿，把正在蓬蓬勃勃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新中國塗成一片漆黑，妄圖達到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目的。

九大城市座談會是儲安平親自指揮的一個大規模的陰謀活動。他在章伯鈞的支持下，既不同中共中央统战部聯繫，也沒有向各民主黨派中央請示，就作了布置。在記者出發前，儲安平面授機宜，指示記者，要找有代表性的、素來有不滿情緒而又敢於說話的人參加座談。有一個記者曾經向儲請示，如果有些人雖有代表性而“無事可鳴”，有些人雖“敢於鳴放”而卻沒有什麼代表性又怎麼辦？儲安平肯定地指示，邀請後者。這就充分表明了他是企圖利用那些心懷不滿的人，利用知識分子落後的一面來為章羅聯盟的陰謀打先鋒。儲安平還怕這些人有“顧慮”，要記者在邀請之前，分別登門拜訪，煽動這些人大鳴大放。完全撇開當地中共黨委，他只叫記者和民主黨派地方組織聯繫。有些地方，儲安平還親自寫信與當地的右派分子直接聯繫，或者指明要記者找那些右派分子，找那些人就某些問題鳴放。例如復旦大學的王恒守，是上海第一個提出取消高等學校黨委負責制、主張所謂“教授治校”的右派分子，儲安平就指示駐上海記者一定要邀王恒守參加座談（按：駐上海記者沒有接受這個指示）。這種布置，顯然是為了集中力量對黨對政府進行攻擊。

從5月初起，在短短一個月里，見報的座談紀錄就有十一次，占了十二個整版，約有十三萬字。除了座談紀錄而外，組織座談會的記者還拍發了近二十個專電，寫了十幾篇通訊，一直到6月5日見報的青島座談會紀錄始告結束。在這一段時間里，我們的報紙，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提供了講壇，發出了大量的荒謬言論，對黨進行了惡毒的攻擊，在各地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從我們編輯部工作人員來說，在這些座談會的報道工作中，也暴露出許多問題。

座談會的組織和報道，各地情況有所不同。最惡劣的如沈陽，主持這個工作的本報黨派部第二主任王少桐，甚至採取了向中共省委書記“將軍”的辦法，用對立的態度提出難題，例如什麼“這裏鳴放不起來有歷史根源，你的看法怎樣？”等等。另一記者殷毅還寫了鼓吹“廣發鳴放”的題為“第一朵迎春花”的通訊。又如在武漢有一個座談會，這個會如何召開，邀那些人參加，是和右派分子馬哲民商議的。我們的記

省在那里还一连举行了三个座谈会。主持这一工作的學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还说：“这次到武汉是儲安平首次亲自布置工作，要做好！”潘文彬还写了兩篇通訊：“武汉書簡”和“四顧無知己，比鄰若天涯”，強調所謂“春風不渡武胜关”和党与知識分子关系不正常。广州座谈会开过以后，主持工作的記者，竟然还有“不滿足”之感，認為談得不够“尖銳”；在儲安平所謂“依靠民主黨派”的指示下，西安、蘭州的座谈会，几乎为右派分子所操縱。青島座谈会是由記者鍾光貴主动要求举行的（儲安平原来也有此打算）。这个座谈会由右派分子徐一貫主持，并听任徐一貫的操縱，多邀右派分子参加。鍾光貴在报道座谈会的消息的“專訊”上，也大量摘录了徐一貫的反动的具有煽动性的發言。主持南京座谈会的記者，推說時間来不及，竟不願把纪录給党委统战部看。总之，按照儲安平的指示，要撇开党来“帮助党整風”。只是上海座谈会，对当地党委领导的鳴放，起了些协调作用。

到各地的記者按照儲安平的指示，下車伊始，不等开会就發回專电：这里沒动，那里不放。5月3日就登了兩条消息：“武汉知識界的鳴放密云不雨”，“山东文教界認為領導对鳴放支持不够”，5日，“沈陽文教部門鳴放空气稀薄”，6日，“西安有些高等学校沒有貫徹鳴放的精神”，8日“南京鳴放空气不甚濃厚”。这些接連出現的專电，总起来是一句話，党不放，我們要他放。座谈会的消息，也在当天用專电拍回，而專电的内容，把最具有煽动性的、強調“春寒”“春迟”，“深溝高牆”的所謂“警句”，集中地、突出地摘录下来；或者以記者自己的口吻加以誇張；或者假用所謂“有些人說”把記者与發言人的“共鳴”之点，加以渲染。如5月11日的沈陽專电：“有些黨員，还該糾正‘老子天下第一’的思想和傲然‘鶴立雞群’的气勢。”5月10日武汉專电：“大家認為……甚至一般黨員都自視為統治者、改造者、把党外知識分子看作被統治者、被改造者，以至在党群之間挖下了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但是，我們这次檢查武汉座谈会的發言纪录，並沒有所謂“統治者、被統治者”字样。这更是無中生有了。如5月15日南京專电：“大家認為南京还是早春气候，有人認為，在基層还被严寒封鎖”。座谈会消息的标题，更是以“推牆填溝”，“轟开局面”，“順

處處重重”等等煽動性詞句來形容黨群關係一團糟。在編排座談會紀錄時，也把每個發言人的最壞的詞句，集中扼要地編成黑字小標題，極盡挑撥煽動之能事。如5月11日發表的西安座談會紀錄小標題有“三個大老虎，變成三個大妖魔”（按：即指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5月17日發表的武漢座談會紀錄的小標題有：“武漢大學的黨群之間有一座銅牆鐵壁，這是有些黨員的特權階級作風筑成的銅牆鐵壁……”；5月14日發表的沈陽座談會紀錄的小標題有：“民主黨派組織，在高等學校里像‘花瓶’，是擺樣子的……”等等。類似這樣的小標題，多得不勝枚舉。在刪節座談會發言紀錄時，也大都把正面的意見刪掉。

由於我們的記者編輯中，有的同志政治認識模糊、立場不穩，在備安平執行章羅聯盟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陰謀活動中，受了備安平的指使，不自覺地成了處處點火的執行者。個別的人，甚至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站在一個立場，在若干問題上，迎合附和者有之，興風作浪者亦有之。我們對這方面的問題將作進一步的深入檢查。

歪曲宣傳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企圖把民主黨派 引向資產階級的政治方向

章伯鈞在向社會上販賣他的資產階級民主的同時，以他社長的地位也把什麼“兩院制”，“民主黨派大有可為”的荒謬主張，來影響我們的編輯部。備安平來到報社以後，更把章伯鈞的陰謀在宣傳工作中具體化。他們離開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政治基礎——社會主義，來歪曲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政策，他們在宣傳民主黨派的活動的時候，竭力誇張民主黨派在國家事務中的作用。大肆強調對共產黨的“監督”，企圖煽動民主黨派篡奪和對抗黨的領導。備安平說光明日報過去宣傳民主黨派教育成員和改造成員思想的作用，是把“民主黨派在群眾和黨之間的橋樑作用，變成了一座獨木橋。”因此，他非常強調所謂“雙軌”的宣傳方針，說是要着重宣傳民主黨派代表群眾利益監督共產黨。對於民主黨派的重要任務——思想政治工作，備安平很不感興趣，而是意在言外地認為只有民主黨派是代表知識分子群眾的利益，因而要代表他們監督共產黨。這就是把共產黨描繪成一個脫離知識分子群眾的黨，并

把党和知識分子对立起来。企圖把知識分子抓到自己的手里，把民主党派由党的助手变为党的对手和敌手。这是儲安平一再宣傳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的主要的組成部分。

在儲安平宣傳方針的指导下，本报对民主党派性質、任务的宣傳，出現了一系列的、严重的政治錯誤。

首先，在这一段时期的許多新聞报道和座談会發言中，把叫囂民主党派不受重視、沒有發揮作用以及民主人士有职無权等等，用显著的地位登在报上，企圖在讀者中造成“党天下”的印象。对于报道有些民主党派基層組織不受重視，發揮作用不够，以及对某些担任政府领导工作的非党人士的职权尊重不够，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但是，我們却夸大了这些个别現象，得出普遍性的結論；甚至在某些报道中，还歪曲了事实。这样，就挑撥了民主党派和党的关系，更为恶劣的是企圖煽动民主党派反对共产党。在这一段时期，極少甚至沒有正确地宣傳長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針，極少甚至沒有正确地报道民主党派在中共领导下所發揮了的作用。

第二，5月8日第一版，刊载了西安各民主党派討論如何發揮民主党派作用的新聞中，認為民主党派过去的工作是：“只站在党的立場，沒有站在群众的立場上。因为只站在一面，就不能很好地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見和要求……”这是把党和知識分子群众对立起来，肯定共产党是脱离群众的。这条新聞，宣傳了只有民主党派能代表知識分子群众的謬論。

第三，在大鳴大放和帮助中共整風的初期，大量报道了民主党派为某些人向党进攻“撑腰”。如5月27日第二版刊登的农工民主党派座談会的新聞，6月1日二版刊登的民进北京市委的會議新聞，6月3日二版刊登的九三学社北京分社的會議新聞中，竟說：民主党派成員和所联系的群众，如因为“鳴放”和帮助共产党整風遭到打击，民主党派一定大力“撑腰”。不但新聞中如此写，而且用一号字的大标题，触目惊心地标了出来。由新聞写作的邏輯来看，給了讀者这样一种印象：有些人帮助共产党整風，可能会受到党员的报复。如遇这种事情，共产党的态度如何呢？避而不談。只着重突出地宣傳民主党派要出来“保鏢”、“撑腰”。

鮮明地擺出一付面孔：共產黨不管知識分子群眾，甚而會打擊他們；只有民主黨派是保護他們的“正當利益”。把民主黨派放在共產黨“敵手”地位，而且只有民主黨派的作法正確，共產黨是會給知識分子打擊報復的。就這樣的惡毒地誣蔑了共產黨。

第四，更為錯誤的，循着這樣的“宣傳”路線，發展到6月9日，刊登了章羅聯盟所搞的反動的科學綱領全文，更嚴重的是組織了“短評”。提出“保護科學家”的口號，並說這是民主黨派對共產黨監督的具體的新的方式方法，認為有很重大的意義。這是惡毒地挑撥了科學家和共產黨的關係，露骨地說：只有民主黨派是保護科學家的，不要跟共產黨走。

第五，不顧中共整風的計劃和步驟，三次報道民主促進會召開的中小學教師的座談會；5月16日而還以整整一版的篇幅，刊載了一個中學教師的座談會紀錄。而在刊登這些報道和座談會紀錄的時候，有的採用了惡劣的詞句，以煽起中小學教師對黨的不滿。

第六，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民主黨派座談會和工商界座談會結束之後，本報黨派部有的負責同志擬了四個問題，在儲安平支持下準備向李維漢部長“將軍”。其中有這樣的問法：“能不能說這兩次座談會的鳴放是敞開的？”“在您看來，所揭露出來的人民內部矛盾，是意料所及呢，還是大吃一驚呢？”等等。這次“將軍”的企圖雖然沒有實現，但也可以看出他們在民主黨派報道工作上究竟採取了什麼樣的立場和態度。

另外，更其惡劣、嚴重的是：本報工作人員謝楚在全國人民開始反右派之後，她還企圖通過採訪農工民主黨一個座談會的新聞，別有用心地輕蔑反右派鬥爭。農工民主黨在6月11日舉行了一個座談會，謝楚集中寫了這個會上反對反批評的意見，如說什麼“現在是不是用圍剿王蒙的方法來圍剿儲安平和葛佩琦呢？”和“必須考慮到不要阻礙了鳴放”以及“反批評不恰當，就會引起不平”等等（這個別有用心報道，沒有見報）。

這一系列的宣傳報道，說明了一個事實，這一時期的本報對民主黨派的宣傳報道，是在資產階級右派野心分子的指使下，歪曲了長期共存。

互相監督方針，企圖把民主黨派引向資產階級的政治方向，要把民主黨派變成共產黨的對手和敵手。

歪曲黨的政策，挑撥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

5月4日，本報發表了題為“大膽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的社論（本報學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執筆，經儲安平親自审阅同意）。這篇社論是本報利用社論形式，向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進行煽動的一篇具有綱領性的文章。

社論中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和“五四運動”相提並論，顯然是原則性的錯誤。“五四運動”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是人民內部的自由在文藝工作和科學工作領域中的表現”（陸定一）。一個是對敵人的革命運動，一個是人民內部的自由問題。而這篇社論却號召“繼承和發揚五四的文化革命運動的傳統”，把敵我的界限混淆了。不僅如此，社論還把這個政策說成是“波瀾更為壯闊、規模更為宏偉的文化革命運動”和“思想革命運動”，更是对黨的這個政策精神的歪曲。

社論一再說這個政策是為了反對教條主義思想和機會主義思想。但是對於反機會主義思想的這一點，說的不明不白，特別是跟資產階級思想進行鬥爭這一任務，文內根本沒有談到。

社論第二段開頭，是從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和在中共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談起的，彷彿這篇社論是根據毛主席講話的精神來論述的。但是，讀了全文以後，就會發現，這篇社論並沒有正確地根據毛主席講話的精神來闡釋問題，而只是在盡“吹鼓手”的煽動作用。如該數第三段的末句說：“……體會中央的方針政策的精確，不要作寒蟲，而要鼓起力量，迎接春天。”這就不僅歪曲了中央的政策精神，而且，很顯然是和費孝通這個右派的“吹鼓手”相共鳴，唱同樣的反調。

如果把這篇社論作為一個綱領來檢查本報在這段期間發表的反動報道和文章，那麼，歪曲黨的政策，挑撥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我們在這方面的錯誤是最多最大的。在這一系列的宣傳中，着重誇張黨群關係的不正常；其實質就是挑撥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煽動知識分子對黨的不

滿。

我們在这里只舉出几篇專論和通訊來作一些檢查。

本報先後發表了費孝通的“早春前後”和范朴齋的“會外之音”兩篇文章。這兩篇文章，都是執行章羅聯盟拉攏知識分子的陰謀，向知識界做煽動宣傳，極盡挑撥黨和知識分子關係之能事的。在前一篇文章里，費孝通主張要用“互相監督”來揭開“蓋子”，甚至提出“沖開”蓋子。在後一篇文章里，范朴齋惡毒地攻訐了黨員和積極分子，並進一步煽動知識分子要在“鳴”“放”中把“肚子裡的悶氣”“發泄”出來。而這兩篇文章，正是在所謂“春暖花開時節”，亦即毒草滋長的時候，由儲安平親自約來或親自處理的。

為什麼儲安平對於這些反動言論大為欣賞呢？儲安平曾主張光明日報要成為民主黨派和高級知識分子的講壇。他就是組織、刊載這種反動言論，來盡到他所謂的“監督”的責任。

本報記者所寫的一些通訊中，有不少是有嚴重錯誤的。这里舉出兩篇。一篇是記者文冰所寫的題為“四顧無知己，比鄰若天涯”的武漢通訊。這一篇通訊充滿了某些知識分子的不滿情緒，以個別概括一般地渲染了黨對知識分子的不尊重、不信任，把今天廣大知識分子的面貌全部歪曲。這在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上，起了煽動作用。這篇文章的寫法，對於錯誤的意見，完全沒有分析和批判，也沒有發言人的姓名，作者的思想感情與發言人完全取得共鳴。

另一篇，是記者丘林所寫的武漢通訊，報道右派分子馬哲民談武漢為什麼“鳴”不起來的問題。馬哲民對思想改造運動和肅反運動，破口大罵，惡劣透頂。記者不分是非，加以報道。通訊中這樣寫道：“馬哲民教授說：像這樣的苦水和牢騷不讓他們傾吐出來，要他們‘爭鳴’別的問題是很少有真實的興趣和感情的。”全篇談話都是貫穿著惡意和煽動。記者竟然全部有聞必錄，替馬哲民的謬論作了宣傳。

反對黨領導高等教育

章羅聯盟中的一項陰謀，是鼓動高等學校的教授起來反對黨委負責制。儲安平執行了這個陰謀。在這期間，本報發表了不少報道，煽動大

学教授对党不满，反对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制，引起广泛的恶劣影响。

章罗联盟这个阴谋蓄意已久，他们利用“民盟中央工作简报”（内部刊物，载于5月10日出版的第15期）大胆歪曲最高领导方面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预先散布谣言，说什么高等学校中的党委负责制可以考虑加以改变。本报有关同志，在思想上受到影响，竟认为高校中的党委负责制，迟早要取消。本报从5月7日在第一版发表的中共中央统战部、清华大学党委会、民盟、九三学社等召开座谈会的一个报道中，就强调了对高校党委负责制不满的片面意见，并标出了“讨论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问题”的大字标题，做了第一版的头条新闻。此后在若干报道中，一再加以渲染，制造反对党委负责制的舆论，混淆了是非。

在这方面的错误报道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负责制”这个报道。这个失实的错误报道，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各地读者纷纷来信反映，有些学校已经因这条消息的煽动，引起了混乱现象。许多读者提出质问，并要求作检查和公开答复。本报已于7月5日就这个错误，发表了检查报告。现在值得在这里着重指明的，是储安平对这个错误始终不肯承认。他不肯发表承认错误的更正消息，反而布置记者去访问陈望道先生，写出了6月5日刊出的消息，如我们在检查报告中所说的，意图掩饰错误。而尤为恶劣的是，他看到人民日报发表复旦大学没有取消党委负责制的消息的时候，一再和有关同志推敲人民日报为什么要发这条消息，要和人民日报对抗，并在本报部主任会议上说什么“人民日报硬说我们错了”的话，要大家回到各部去传达，以挑拨本报工作人员与人民日报的关系。处理这条消息的，是学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他在思想上早就认为高等学校中的党委负责制“毛病”很多，迟早要取消。因而，他对这一稿件，不管其是否可靠，不加核对，也不考虑发表后的政治影响，当作好新闻要记者立即写出。当人民日报指出错误以后，潘文彬仍然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反而不顾党员同志的忠告，亲自访问了陈望道先生，并派记者访问了参加那次座谈会的其他人士，意图掩饰错误。尽管结果仍然证明报道是错误的，最后还是按照储安平的意图，写出那样一个似更正非更正、实质上是和人民日报对抗的报道，

更加混淆了是非。這說明了發表這條失實消息的錯誤，原因並不簡單，而是在潘文彬的思想中，對於黨領導高等學校，有着錯誤的看法，從而與備安平有了共鳴。

章羅聯盟為了陰謀取消高等學校黨委負責制，曾在若干高等學校內，處處點火。方式之一，是叫囂所謂“民主辦校”。6月4日，本報報道了北京師大在右派分子陶大鏞主持下召開的座談會的情況，為右派分子張目。此外，“九大城市座談會”中的武漢和廣州兩個座談會的報道，在高等教育問題上，強調了否定教學改革成績的宣傳。尤為嚴重的是，在6月12日本報發表的“青島三位學者談鳴和爭”一個報道中，仍然把右派分子陸侃如有關高校黨委負責制的荒謬意見發表了出來。

不僅如此，還對於有些大學的整風工作做了歪曲事實、一口否定成績的報道。本報記者徐穎所寫的“中國人民大學像個教條主義的大蜂窩”一篇報道，就是顯著的例子。這篇報道激起了中國人民大學數千同學和教職人員的抗議。

這篇報道，否定了人大幾年來全部的成就。認識人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學工作像毒蜂一樣在散布毒素，對黨員同志竟以最惡毒的詞句來謾罵。對座談會中片面的錯誤意見加以誇張，對正面的善意的批評，只是輕描淡寫的一筆帶過。尤為惡劣的是，竟把報道中最壞的形容詞摘出，做了一個聳人聽聞的反動標題。這篇報道，從頭到尾只顧引用最壞的形容詞來謾罵這所社會主義的新型學校，實質上，一方面是利用反教條主義的口號，來毀謗學習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障地；另一方面是在黨能不能領導高等學校這一問題上，作了“否定”的宣傳。

還有一些報道和文章，對有些學校的整風，起了破壞作用。例如5月9日發表了一篇批評北京師範大學“不肯大膽的放”的報道，說：“外面雷聲震耳，師大無風無雨”。實則北京師範大學黨委會已經組織舉行而且在準備有步驟地繼續組織教師座談會，希望聽取教師們的意見。這條報道的發表，就與該校的右派分子起了呼應作用，助長了該校右派分子的囂張氣焰。繼之於5月22日又發表了該校中文系教授、右派分子穆木天的文章“我的呼吁”。這篇文章以莫須有的事，向該校黨委會進行了惡毒的攻擊，這就火上加油，使該校右派分子的氣焰更高，右

派分子的荒謬言論一度非常猖獗，打亂了該校的整風步驟。

煽動大學生鬧事

到基層點火，到大學中點火，是章羅聯盟和其他右派分子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的陰謀活動。儲安平利用光明日報，在大學生中點了火。在他的直接指揮之下，5月26日發表了“北大開辟‘民主牆’”的報道。儲安平跑到北大看了大字報，回來就通知本報學校教育部立即報道。總編室主任一再向儲提出，這樣報道一定會起煽動作用，擾亂整風步驟，對人民不利。但是他完全不理。他說：“是事實就要報道”。爭論到最後，他斷然地站起來說，要“考驗考驗”，一定要即日見報。總編室的意見也向學校教育部提出，有關同志說，“學生壓力太大，不報道不行了。”“群眾已經跑在前面了”報紙落後了！”這個報道是由學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親自執筆的，他說要盡量向健康方向引導，強調不誤學習幫助整風。但是，儘管他“煞費苦心”，一點也不能避免這個報道的強烈的煽動作用和惡劣後果。

“北大開辟‘民主牆’”報道見報的第二天，儲安平在到清華大學和錢偉長談話之後，又指揮學校教育部報道清華大學學生的鳴放。學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和一些記者写出了清華等九大學學生鳴放的報道。儲安平要立即發表。總編室主任提出堅決反對，發生了兩天的兩次大爭論，第二次潘文彬在場，他也提出“部里的同志都主張發表”。經過這樣劇烈的鬥爭以後，潘文彬始推故把這報道拖了下來沒有發表。

在北大民主牆的報道中，突出地反映了右派分子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反對民主集中制的陰謀。諸如“出席團代大會的代表如何產生”“選拔留學生由黨團員包辦”，“畢業生分配工作對黨員分配好的崗位”，“把政治課改為選修”，“取消學校中的黨委負責制”等等。這些意見，有的是歪曲事實，有的是對黨的惡毒進攻。

在報道中，有着“據聞江隆基副校長也表示歡迎”的語句。這樣的報道方式，正符合了右派分子篡改本報政治方向的辦報方針。右派分子所採用的惡毒手段之一是向黨“將軍”，而這樣的報道就正好符合了這個要求，向北大黨領導將了一軍。同時又等於向各地學生暗示（也可以